

『并没有一个永久秋天』

读巴金长篇小说《秋》

□曹青

《秋》是巴金“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这部小说是《春》的延续，故事依然围绕高公馆展开。读之前猜测，“春天”到了之后，故事场景可能转换到上海，《家》的主人公之一觉慧或将重新登场（从内心来说，我更希望知道“新青年”觉慧过得怎么样）。然而，没有。跑到上海的觉慧和淑英没有正面出现过，故事以高公馆一家子人的散伙而告终。

在这个系列作品当中，《秋》的篇幅最长，厚厚的一大本，与前二者相比，可谓字数暴增。小说出续集，往往吃力不讨好。对这个系列，我的阅读体验是《秋》明显比前两部（尤其是《家》）乏味。叙述拖泥带水，甚至常常不见情节，只是日常絮絮叨叨，让人不得不强打精神，以十二分的耐心逼迫自己看下去。直到快结束时，高氏老四、老五闹着要卖了高公馆分钱，当家的老三高克明被气死，高公馆终于卖了，一个家族的人各奔东西，这才让人找出了小说的味道。

当然，作品可读性虽然不强（对普通读者来说），但还是有几个角色可以留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不管是可悲的还是可恶的。

在《春》已登场的枚少爷，成了这部书的重要悲剧人物。这是一个比觉新还软弱无用的年轻人。他天天被长辈围着，一点自由也没有。所以，他说“我不晓得人生有什么意思”。他的胆子是那么小，一只猫便可以把他吓得战抖（第六章）。枚少爷甚至有病也不敢声张，终于年纪轻轻就死了，其实是死在他父亲周伯涛手上。是什么让一个人窝囊成这个样子？如果年轻人都是这样，社会还有什么希望？从枚少爷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个人没有身心自由太可怕了，和动物没有区别。所以自由是可贵的，人们为之奋斗了千百年，而在枚少爷这个年代，追求自由依然是一种奢侈。

高氏五房的小姑娘淑贞也是个悲剧人物。她虽然父母健在，但从没得到父爱母爱，一辈子活得战战兢兢。在第四十二章，淑贞跳井身亡，结束了年仅十几岁的生命。这个时候，她那头脑简单的母亲才懂得了悲伤。“激流三部曲”被作者写死的人并不少，尤以淑贞之死写得悲惨。这些无辜的生命，在字里行间化作重重谴责与反思，为作品平添厚重感。

“老牌”悲剧人物当然还是觉新。这个人贯穿《家》《春》《秋》，典型的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因为“承重孙”（长房的长孙）的身份，认为高家需要他来撑场面，只好主动挑起他根本挑不动的担子。他一味回避矛盾，坚决不惹事，见人就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切矛盾还是对准了他，使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不堪重负。觉民责备他：“你害了你自己，又害了别人！”（第四十八章）这话基本没错。在“礼教吃人”的社会，不抗争，不会有出路。他的表现，总是让旁观者替他着急，简直想痛骂他一通。还好，最后，他总算有所改变，高公馆解散了，他也获得了一定的解放。巴金在本书的序中说，本来不想让他活下去的，但后来还是让他和翠环结合了。他的人生有了一丝希望。对应的现实却是，巴金的大哥还没来得及看到第一部《家》的出版，便自杀了。

在这部作品中，可恶的人当然也不少，最可恶者当数枚少爷的父亲周伯涛。这个思想腐朽的老顽固，不让儿子进学堂，还因为不信西医，活活将儿子逼死了（其实，枚即使不死，活着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在前一部《春》中，周伯涛以同样的方式把女儿蕙给害死了。所谓的“礼节”，让周伯涛成了一个失去人性的动物。死后，他连其下葬的事也不顾不管，哪怕一家人都指责他。周伯涛是这个制度中最变态的人。从他身上，就可以看出“礼教”是怎样“吃人”的。而觉新的四叔、五叔的丑陋面目，也在这部作品中展现无遗，虽然在此前的两部书中也有提及，但前面的表现尚不充分。

像周伯涛这样的顽固势力当然不小。他们愚蠢、自私、虚伪。他们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尤其是对西医学有着极端的偏见，不把他人生命当回事。他们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正是“革命”的重点对象。所以，作品的先进之处，便在于不遗余力批判旧制度，抨击旧礼教。在第十章，觉民和觉新争论时，明确提出要推翻这个制度。觉新带着恐怖的表情说：“这是革命党的主张！这是社会主义！”觉民却坦白地答道：“这还是无数年轻人的主张。这个时代应该是年轻人的时代了。”到了后来，连觉新的继母周氏也明白了，这个时代属于觉民、琴、淑华、芸这些年轻人，只有他们才可以给她一点光，一点温暖（第四十二章）。至于远在上海的觉慧、淑英，更是走在时代前列了。另一群作为配角的年轻人，也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比如黄存仁、程鉴冰和张惠如、张还如兄弟等。他们追求进步，认为用自己的两只手生活才是清白的、正当的，张惠如想做一名裁缝，张还如的愿望则是做个剃头匠（第二十五章）。他们这种劳动不分贵贱的思想无疑是超前的，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共识。正是因为这个年轻的群体，让读者看到了希望，这也是本书最大的亮点。

原以为秋天是天高气爽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但在《秋》中，满纸都是萧瑟，更多的是悲凉。为什么取这么一个书名？答案似乎在觉新的言语中：“我真害怕秋天，我害怕看见树叶一片一片地落下来……我的生命也像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生活果真如此无望吗？还好，琴用自己的观点破了这个局：“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并没有一个永久秋天。”“我倒没有见过一棵树就单单为落下的叶子死去，不在明年开花的。”

觉新那个时代过去百年了。当年的那种沉闷早已不复存在。但这种写实的小说，并不因此失去意义。它虽然在可读性上会因为代入感的降低而呈现越来越明显的不足，但由于它客观地记录了一个时代，这些人物依然活跃在纸上，活跃在人们的遐想中。

彰显小红军精神的英雄史诗

葛顺连的报告文学《少共·小红军》，全景式、史诗般地展现了1927年至1936年间，少共小红军在重建团支部、打土豪分田地、破迷信废陋习等方面的革命贡献。

作者以当代的眼光关注历史人物，以极富情感的笔触，描写了大量生动鲜活的少共小红军形象，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演绎了革命传奇。她注重把握儿童心理特征，比如皮定均用打土豪的50块钢洋玩砸整

等。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胡福妹、张锦辉、饶玉鸾等一批少女红军形象，展现了革命中的女性力量。

基于广泛的调研，葛顺连在创作中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增强艺术效果。如陈先瑞送信、春秀打草鞋、秀萍唱山歌等情节，既不失其真实性，又有想象的生动性。作品七个篇章看似独立，实则有其时间和事件逻辑，显得恢宏、立体。而作品中俯拾皆是歌谣、诗歌，在增强现场感的同时，也有了鲜明的诗性色彩。（程箫）

寻找失散于历史烟尘的明珠

葛顺连将目光对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青团员，为读者呈现了一段不太熟悉的少共史。选材上的创新，不仅跟她的写作视角、意识有关，也离不开史料来源的多样与独特。

为了在选材上别具一格，葛顺连在整体上尊重党史、红军史的历史叙述脉络的基础上，以自己的采访为主，结合当事人的回忆录、当时的报刊杂志和民歌民谣，将一颗颗失散在历史烟尘中的明珠发掘出

来，以个体记忆填补了社会记忆留下的缝隙乃至空白。全书分为恢复篇、参政篇、教育篇等七个专题，看似对1927年至1936年那段线性历史进行了切割，但是，由于作者采用了“冰糖葫芦式”结构，调动了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可歌可泣的少共革命史得到了立体化、全景式的呈现，细节生动，活灵活现，具有逼真的现场感和隽永的意境美。（刘汉波）

历史书写与精神传承

《少共·小红军》聚焦了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根据地”到“建设苏维埃政权”再到“留守苏区或随队长征”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以讲述胡福妹、谭启龙、刘志坚、萧华、陈丕显等众多小红军的感人事迹为主干，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用文学艺术形式生动诠释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永恒初心。

阅读这一作品，不仅有着极强的历史现场感，也让我们深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央苏区的历程，原来与苏区当地的这群“小鬼”的努力有关。当我看到胡福妹被绑、顾作霖借别怀孕妻子的那些情境描述，更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真实的历史情境再现，作品向今天的我们传递了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和不怕牺牲、敢于捐躯的崇高精神。（许丽）

普通人的红色故事

这部作品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记录了中央苏区大历史背景下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的红色故事。

在叙事时间上，这部作品以共青团的发展历史为主线，在每个时间节点上，穿插了这些参与共青团发展的小红军的故事，他们是普通人，也是在共青团发展时间线上留下印记的小英雄。

在叙事空间上，作品紧扣赣南这块红色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孕育的那些勇敢、坚韧的小英雄。在这

些普通孩子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部具有强烈地方文化的红色历史，有别于精英与大历史，作品让这些为红色革命作出贡献的无名者，呈现了自己的姿态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所以这部作品通过对普通人的红色文化书写，恢复了被遮蔽的普通人的红色历史图景，连接了现在与过去，乡村与革命，而身处红土地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寻找与认识自身的主体性与存在价值，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纪实文学在红色革命历史书写中的价值和意义。（刘丽芸）

书写红色文艺新篇章

《少共·小红军》以苏区时期小红军的故事为切入点，讲述了苏区时期共青团的组织建设、教育建设、战争动员等方面的内容。全书向读者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革命为什么会在苏区发生、如何在苏区得到发展，以及苏区革命为何最终发展成为星星燎原之势。

从大文学史观的角度而言，《少共·小红军》也有它的应有之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讲到革命文艺，首先想到的是延安文艺的创作和研

究。苏区文艺在整个文学史上都稍显寂寞。苏区有这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把这些红色故事讲出来，《少共·小红军》做了很好的示范。作者以田野调查式的方式，深入调研并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创作中做到了文学性和历史性的统一。我们相信，《少共·小红军》的出版，会激励和鼓励更多的文艺工作者投入到对苏区故事的书写之中。（吴泰松）

历史深处花正开

在《少共·小红军》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回忆视角和第三人称的叙述穿插交替，让读者走进“文学现场”。通过对英雄成长的叙述，把英雄个人的成长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葛顺连不仅为读者展示了人物成长历程中的典型事件，更在字里行间巧妙地留下了想象的空白。作者开篇塑造了胡福妹这一女英雄形象，并打破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柔

弱、依赖和顺从性格的刻板印象，展现了战争年代女性对革命的重要贡献。《少共·小红军》作为纪实文学，它承载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它追求的是全方位的“真”。纪实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艺术表现力，更在于其传达出的理性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内核是纪实文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孙以炯）

文学史中的“小人物”

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色革命事业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的革命精神与理想信念成为哺育一代代青少年的养料，并参与我们的精神建构。在这些英雄中有一部分是“少年英雄”，比如王小二、雨来、潘冬子等，他们已成红色文艺的经典形象而影响深远。

葛顺连的《少共·小红军》赓续着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形象谱系传统。作者以非虚构的方式，在挖掘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为我们呈现许多鲜为人知的小红军形象。根据小红军在革命事业中的不同角

色，作者用七个篇章把这些人物串联起来，同时，通过丰富的文学想象，把这些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在讲述他们或她们革命故事的同时，表达作者的礼赞、敬仰与情怀。作者的努力，一方面进一步挖掘了赣南大地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一方面也为红色文化资源建设做了铺垫性工作。我们期待着，假以时日，作者能在此书的基础上，选择部分有拓展空间的小红军故事，展开合理的文学与历史叙事，创造全新的、经典红色小英雄形象。（明飞龙）

今年，我市作家葛顺连新作《少共·小红军》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日前，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少共·小红军》研讨会在赣州市文化馆举行，约6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回顾长征历史，探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小人物·大世界

——评葛顺连《少共·小红军》

